

从广东到上海：香山帮构建的买办网络

马学强

买办作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之外的人物，是近代口岸城市中一个独特的新群体。这部分人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他们最早与西方的近代经济发生关系，并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及借助于外国势力的强势渗透而逐步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继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富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

在中国买办群体或阶层的形成中，香山籍买办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近代中国的许多买办从广东的香山县（1925年改为中山县）产生，香山由此被称为“买办故乡”。关于香山籍（或香山帮）买办的研究，此前关注较多的是几个重要买办，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莫仕扬等人及其家族，而将其视为一个群体来进行研究的则相对较少。香山帮买办作为一个群体，首先涉及的是这一群体的产生及规模问题。社会学中的“群体”，其力量“并非来自其静态形式而是其动态属性”，所以必须研究“群体内部发生了什么”，并由此联系到群体的规模、群体的思维等。香山帮买办如何产生，由哪些人担任，为什么是他们，他们在哪些口岸城市、哪些洋行任职，群体的内部构成又如何，凡此等等，都需要对香山帮买办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基础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买办样本，并据此作出类型上的分析。关于香山帮买办，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中有不同的构成，他们的产生背景、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收入状况、社会生活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取样过少，分析过于简单化，从中得出的观点与结论自然有所偏差。所以，要避免这一状况，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买办以及深入考察香山帮买办群体的复杂构成。

由此涉及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资料的来源及其研读。有关香山帮买办的资料淹没在大量的中外文献档案里。这里，着重介绍其中的两个部分：（1）我们整理了一份近百名香山籍买办的名录，并梳理他们的主要事迹。其资料来源是中外报刊（包括《字林西报行名簿》、《北华捷报》、《申报》

等）、档案、地方志、家谱等。（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买办社会生活的调查资料。这主要集中在中国征信所和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档案资料中，此前很少有人引用过。这些调查资料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对与之相关的个人进行的信誉和资历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该行员役和透支的担保人、往来存款户、透支户、其他商家委托调查的人，调查主要由该行调查部经手，也有部分委托中国征信所代为调查。这些调查资料共约300卷，调查对象在万人以上，以姓氏归类，材料丰富。调查时间在1932年到1949年间（个别人物的资料更早），调查地域遍布以上海为主的各口岸城市。在这些调查资料中，涉及买办共计500余名，其中香山（中山）籍买办20多位，内容包括这些买办的籍贯、履历、教育、收入和资产、信誉状况、家庭结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

本文以上海为中心，着重就香山帮买办在口岸城市的兴起、网络构建、经营状况、社会活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买办网络与香山帮买办的兴起

早期中国的通商贸易以广州为中心，所以买办职务大多由广东人担任。受十三行贸易体制的影响，广东人得了风气之先，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他们和外国商人接触的机会最多。那时的买办都以外国人不谙语言，不明中国商业习惯及其他一些原因，“乃居奇制胜，往往过索佣金，或买卖价格上播弄手段，颇可获得巨大之财”。^[1]一些广东商人苟能通解外国语言者，竞相从事该业，以至一些拥有巨万资产的人也甘愿在外商手下谋职，受其役使。

“广东商人由于最早同西方商人来往，1842年之后，在西方商业代理人试图扩大在华经营活动的时候，便成为他们的天然盟友。他们当买办、翻译、收账员和办事员。”^[2]几乎每一家洋行都雇佣了自己的买办。

上海等口岸开埠之后，广东人因为具有对外贸易的经验和在鉴定茶叶等方面的能力而成为首选。在洋行北上的同时，洋商们也带来了他们在广州的

[1] 沙为楷：《中国买办制》，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5页。

[2] [英] 勒费窝著，陈曾年、乐嘉书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雇员。“在广州作为唯一贸易口岸之时，西方人已经逐渐习惯了这里的人、菜肴和广东英语。由于这些缘故，西方商人把广东买办带到上海组建洋行，厨房配备的是粤菜厨师，船厂雇用广东工人修理船只。”^[1]外商对广东人的偏爱，是基于“由乡缘而形成的华人商业组织、个人金融担保的制度”。^[2]这一点在开埠之初的上海也是极为重要的。外商在新的商业环境中，竞相聘请广东人当买办。那些来自广东的买办，代替外商收集农产品收成和商业行情的信息，代表洋行直接同中国商界和银钱界开展商业活动，推销进口货物，收购农产品，招募和担保买办间的使用人，并且担保赊欠账款的偿还，等等。如上海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不仅要总对总行的华人负责，还要向分布在其他通商口岸的买办通报市面新闻和各货交易行情、考查大小洋药的价目等。^[3]对于洋商而言，买办是集总管、代理人、翻译、掮客、顾问、信用保证人等于一身的混合体，由此也奠定了买办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广东籍买办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掌握着广东英语，更重要的是有他



广州十三行路

[1] [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2] [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3] 参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8页。

们的经营网络，尽管这时他们的活动重心从华南转移到江南，但他们仍然凭借原有的关系，重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运销网络。大量事实证明，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开放，由南而北，大量洋行北移，买办成为一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说，上海是广州、香港买办网络的延伸与拓展。而在这个网络构建中，香山帮买办居于核心或重要地位。

香山县，距广州不远，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紧邻原属香山县的澳门，独特的地缘优势让这里的人捷足先登，较早与西方人接触，较早懂得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也较早产生了一批与洋商贸易而致富的商人。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早期的香山买办。^[1]此后，随着一些口岸城市的陆续开辟，香山人走向各地，香山籍买办人数日渐增多，并逐渐形成了他们的势力与网络。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家已经注意到买办组织主要是一种家族机构，许多买办将他们的职务看成是世袭的。典型的例子是香山的莫氏家族与唐氏家族。莫家的奠基者是莫仕扬（Mok Sze Yeung），早年在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同顺行习商，1850年代起历任美商琼记洋行广州、香港买办，1873年任英商太古洋行香港总行买办。仕扬二子莫藻泉，曾任太古洋行香港总行买办。藻泉长子莫干生，后继任太古洋行香港总行买办。^[2]“从十三行学徒到建立庞大的买办家族，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三代跨越近百年的时间，恰恰见证了从行商到买办的过渡、买办阶级的崛起、黄金时代及其没落”。^[3]莫氏家族主要在广州、香港一带活动，但还是可以从一些线索中找到香山的这个买办家族与上海的联系。其一，莫家与吴健彰的关系。吴健彰早年为同顺行行商，也是香山人，与莫仕扬相熟，后莫仕扬长子又娶吴健彰侄女为妻，有姻

[1] 据考证，早在1834年，香山人黄车叶已在多例夷船似作买办，后来陆续有香山人黄添化、吴亚平、鲍鹏等充当买办。详见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2] 2009年3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历史系合办“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上，有多位学者论及香山买办莫仕扬家族。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澄怀古今：莫家三代珍藏”展览，藏品来自香山莫家珍藏。莫氏先祖历任太古洋行买办，影响深远。莫氏家族的后人及文物馆馆长林业强先生为我提供了多幅莫家在上海的照片，在此深表谢意。

[3] 丁新豹：《香港的买办世家：莫仕扬家族初探》，“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3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历史系合办）会议论文。

亲关系，两家走动更为频繁。吴健彰后以捐纳得江南候补道，入股美商旗昌洋行，为七大股东之一。道光十八年（1848）署理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即上海道），先署后任，亦官亦商。期间，香山莫家子弟来沪，多少得到道台吴健彰的照应。^[1]其二，莫仕扬历任美商琼记洋行广州、香港买办，后为太古洋行香港总行买办，为家族成员在上海相关洋行谋职提供便利，如族兄莫仕开即为上海琼记洋行买办，^[2]莫藻泉之弟莫芝轩后任上海太古洋行买办。香山唐廷枢家族也是如此。^[3]唐廷枢在上海的发展，还得到多位香山同乡的帮助，其中一位叫林钦，他是怡和洋行的买办。1861年，在林钦的推荐下，唐廷枢进入了这家老牌的英国洋行，两年后，唐廷枢正式出任怡和洋行买办。^[4]

同族、同乡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买办网络的构建与扩大。当年徐润能在上海立足，多少与他在上海宝顺洋行任职的伯父徐昭珩有关。而郑观应来沪，很多方面借助了在上海柯化威洋行当买办的叔父郑秀山，后来又通过他的姻亲曾寄圃和同乡世交徐钰亭、徐润的关系，转到宝顺洋行工作。从徐润、郑观应他们从香山到上海的经历中，很好地说明了人脉因素的重要性。对此，有学者曾这样评述：“粤籍买办一旦落户生根，又复辗转荐引各自的亲朋乡里入行学徒或充任雇员，而这些人又可以进一步升为买办。”^[5]于是，在沪的香山籍买办人数渐众，他们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彼此关照，相互援引，声势日壮，加之一些同乡官员推动，如吴健彰就任上海道台期间，即与在沪

[1] 吴健彰任上海道台时期，与英美人往来密切。在其任内，即将苏州河以北，虹口港临黄浦江一带划为美国租界。1853年小刀会攻入上海县城，吴健彰被俘，在美公使马沙利援救下脱身。后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外商借款作镇压小刀会军费。1854年6月，与英、美、法三国领事订立《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由三国领事各派一人充任税务司。此为外人管理中国海关之始。是年上海泥城之战清军失利，英美法三国领事迫其接受擅自拟定的新《土地章程》。吴健彰旋被革职拿问，谪戍新疆。

[2] 亦有作“莫仕階”，待考。

[3] 汪敬虞在《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已注意到这一点：唐廷枢的哥哥唐廷植及兄弟唐瑞芝、唐国泰，均为当时著名的买办人物。唐家子孙也有继续为买办者，如唐廷植的儿子唐杰臣，先在美国留学，后继任怡和洋行买办；唐杰臣之子唐纪常也为怡和洋行买办。仅唐氏在怡和洋行，从唐廷枢经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四任买办，为时长达半个多世纪。

[4]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9—160页。

[5]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的广东籍买办商人交往甚密，由此更强化了这股力量。

香山帮买办兴起的另一因素，是与香山毗邻香港、接近澳门，他们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背景有关。在这一方面，唐廷枢可谓是典型，他的父亲为在香港一个外国人的听差。因家庭的关系，与外国人接触较多，唐廷枢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从10到16岁他在香港的一所教会学堂读书。对此，他后来也自称是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1]离开学校，唐廷枢先在香港的一家拍卖行任职，后在港英政府当翻译。1858年来上海，任上海海关副大写，第二年升正大写及任总翻译。1861年，经同乡、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介绍，为该洋行做事。1863年9月，唐廷枢正式担任怡和买办，由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在唐廷枢的经历中，无论是做港英政府翻译，还是任海关的大写，以至当洋行的买办，他早期所受的西式教育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充任买办有许多条件，而懂英语是其中的一个有利因素。唐廷枢在这方面有其优势，他说起来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洋行大班对唐廷枢在英文方面的能力也予以充分肯定，上海怡和洋行经理机昔曾对他的英国同行说：“唐景星英文写得非常漂亮。”^[2]

与唐廷枢相比，徐润、郑观应早年所受的教育还是比较传统的。据徐润自己介绍：8岁，由王丹书开学；9岁至12岁，由王丹书教读；13、14岁，由卢麟教读。^[3]咸丰二年（1852）二月，15岁的徐润结束在家乡7年的私塾生活，离开澳门下香港，随同四叔荣村（徐瑞珩）乘英公司轮船到开埠未久的上海。从学徒开始，学丝学茶，期间与西人韦伯氏等相熟，练习英文。后来徐润当上了宝顺洋行的买办。^[4]比徐润小4岁、唐廷枢小10岁的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出生于香山县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郑鸣岐是一位学者，在当地颇负名望，父亲郑文瑞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在这样一个有着家学渊源、藏书丰富的家庭中，郑观应从小读经书，习时文，并立志在科场上有所作为。咸丰八年（1858），17岁的郑观应在香山应童子试，未中，即奉

[1]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页。

[2] 此见1864年9月27日机昔致香港怡和洋行经理J. 惠代尔（J. Whifall）的信，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2—3页。

[4]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3页。

父亲之命到上海学贾。在走奔洋行之间，郑观应意识到英文的重要性，他曾说：“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1]这是他的切身体验。1859年，郑观应通过同乡亲友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兼营轮船揽载事宜。工作之余，郑观应继续进修英语，一度从英华书馆教习傅兰雅读英文夜馆。^[2]苦读几年，英文水平大进，这为他在洋行谋职提升奠定了基础。后来，他离开宝顺洋行，于1874年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相当于总买办的职务。

关于什么样的人适应做买办，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的标准，因为这取决于洋行需要办理什么样的业务，洋行的差异性决定了选择买办的复杂性。然而，有一项对买办的要求是不少洋商所重视的，这就是语言的训练。“在条约口岸有一种国际语言，人称为洋泾浜英语，或生意英语。这是一种混杂了葡萄牙语、汉语和英语并且带有很多地方俗语的语言。……没有此种能力会被人认为是很奇怪的。”^[3]这是在五口通商之后。在更早的时候，还有一种“广东英语”。所谓的“广东英语”，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4]而这种语言对香山帮买办网络的构建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研究早期买办构成的学者们注意到了香山帮买办与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之间的关系，并认为“香山买办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吸收与创造，形成了富有中国语言特色的‘广东英语’。在‘广东英语’到‘洋泾浜英语’转变的过程中，香山买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5]这样的结论是否恰当，研究相关语言的学者会从语言的构成、变迁诸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在这

[1] 《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民国三年版，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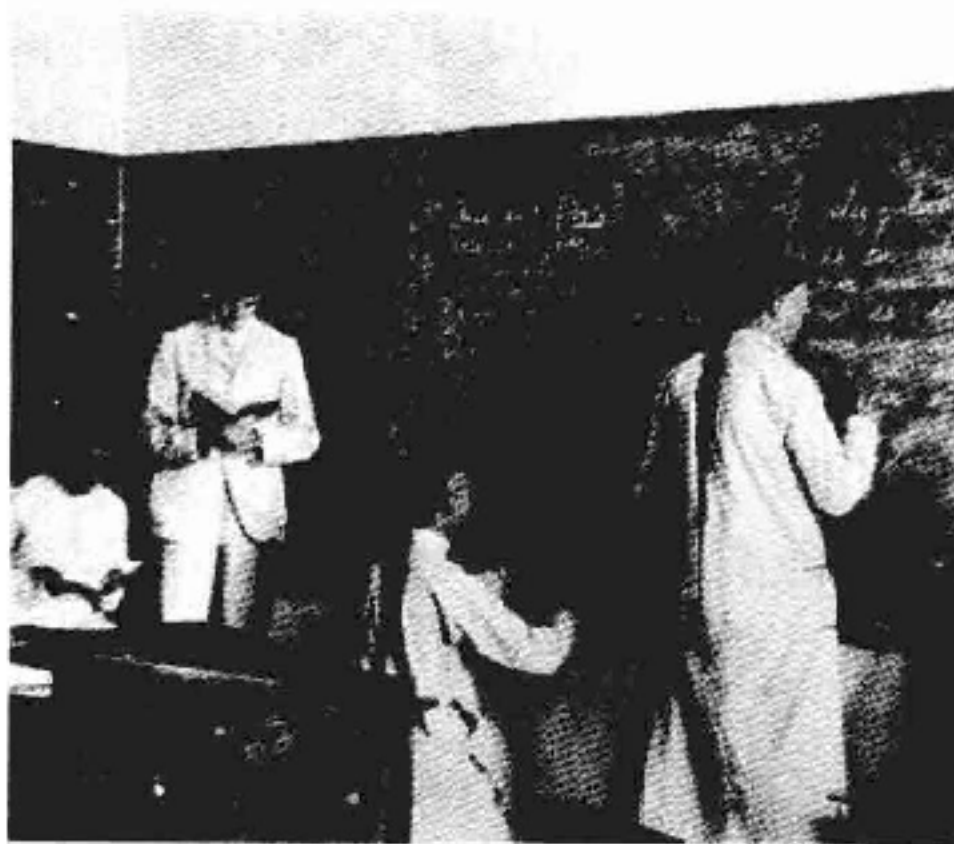
[2] 据《北华捷报》介绍：上海的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成立于1865年，是一所主要“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教会学校。在英华书馆，用英国语言进行认真教学，校长傅兰雅。一些洋行的经理及多位买办（如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唐廷枢等）对该书馆都积极赞助。

[3] 参见[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88—189页。

[4] [美]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

[5] 详见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11页。

里，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其一，是关于唐廷枢与他的《英语集全》。由于唐廷枢的英语出色，所以，洋务中人经常有人向他请教英语，后来他也不胜其烦扰，于是辑录《英语集全》。在卷首他有说明：“这本书是一个隶籍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它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1]



清朝在洋泾浜开设的广方言馆

《英语集全》的出版就是在他担任怡和买办的前一年即1862年。撰写类似书籍的人还有不少，如莫文畅曾著《唐字音英语》，等等。其二，上海通商开埠后，大量粤商随之北上，那些粤商尽管已有多年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并能用广东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但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夹杂着浓重广东方言的广东英语，不能为上海的江浙人所理解，因为江浙人和广东人的口语就“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2]同样，广东人也听不懂这里的语言，香山人徐润初到上海，其叔不忍其流落市井，遂命他赴苏州求学，但即因口音隔阂，徐润根本听不懂吴语，“不惟书不能读，话也不明”，不久仍回上海。^[3]中外通商，五方杂处，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中产生了“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主要是被用于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务活动的需要，因此这种语言也常常被称作“商业英语”，亦称别琴语（Pidgin English）。香山帮买办作为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他们对洋泾浜外语的使用与传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从广东到上海，香山帮买办网络的构成，既有历史的延续，更有内在的关联，洋商、洋行已经逐渐习惯了香山一带人的生活习惯、办事风格，以及

[1]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9页。

[2] 兰宁(G. Lanning)、柯灵(S. Couling)著：《上海史》，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53页。

[3]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1927年，第3页。

他们的广东英语、他们的人际关系，香山人也就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广泛的买办网络。

二、上海香山帮买办的构成与相关研究

近代香山一地究竟产生过多少买办，这是一个颇费心力的课题。胡波先生曾试图做这方面的努力，他列举了“近代香山部分买办一览表”，共收入香山籍买办90位。^[1]应该说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统计表，从时段上看，跨度较大，19、20世纪的买办皆有，但可惜多数买办没有任职的具体时间；从买办的分布来看，自南而北，由东而西，涉及香港、广州、福州、厦门、上海、青岛、天津、汉口等口岸；从洋行的类别来看，有贸易行、轮船公司，还有外资银行，等等，从中可以反映近代香山籍买办的大致状况。

香山帮买办在各大商埠的确拥有一个联系广泛的网络，但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行业的香山籍买办却又有着复杂的构成，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香山籍买办群体特性，还需掌握更多、更充分的资料与信息，并据此进行具体的解析。这里，我们以上海的香山籍买办为例进行考察。在开埠前期的上海买办构成中，最多的就是广东买办，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香山县。据郝延平对19世纪中后叶上海琼记、旗昌、怡和、宝顺四大洋行买办的统计，注明为广东籍买办的有24位，他们是：仕开（See Kai）、朱雨亭（Chu-u-teng）（上海琼记洋行买办）；林显扬（阿耀）、何廉玉（顺昌）、顾丰盛、昌发（Chongfat）（上海旗昌洋行买办）；阿三（Asam）、阿陶（Atow）、阿福（William Affo）、雅记（Yakee）、阿李（Aleet）、林钦（Acum）、唐景星（廷枢）、唐茂枝（廷植）、阿林（Allum）、唐杰臣、唐玉田、唐荣俊、唐纪常（上海怡和洋行买办）；徐钰亭、徐荣村、曾继圃、阿穆（Amew）、徐润（上海宝顺洋行买办）。^[2]唐氏子弟、徐氏子弟及林钦、曾继圃等人，均出自香山一地。在其他洋行任职的香山人还有：郑

[1] 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94页。

[2] 参见[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87—290页；[英]勒费窝著，陈曾年、乐嘉书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观应、杨梅南等，先后为上海太古洋行买办；郑秀山，上海柯化威洋行买办，等等。此后，随着江浙籍买办的兴起，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的力量有所减弱，但只是相对的，一些著名洋行仍聘请香山人担任买办，如陈可良、陈雪佳父子，先后担任上海太古洋行买办。^[1]19世纪中后叶上海香山帮买办的一个特点是：主要受雇于贸易、航运等领域的洋行，如旗昌、怡和、琼记、宝顺、太古等。这些洋行都有一定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倚重香山籍买办，其职务不仅在香山人的内部（同乡、同族）中传接，且随着中国口岸的陆续开放，逐渐形成了以香山帮买办为核心的一个网络，而上海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站点。

从19世纪中叶上海出现买办，之后这一人群的数量不断扩大，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买办在上海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近百年间，上海买办队伍不断更新换代，而香山帮买办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经历一些变化。从行业分布与买办类型上看，早期以洋行（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买办、轮船买办居多，由此使他们成为上海中外贸易的主导性角色。但随着近代上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发生重大变迁，这一时期的香山帮买办也不单是中外贸易的联络人、中介人，而渐次深入到其他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原先的外贸、航运领域，逐渐向金融、工业、商业等部门扩展，这在20世纪前期香山帮买办的构成中得以清晰地反映。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涉及的500余名买办调查中，广东籍买办有58名，是除江浙以外产生买办人数较多的地区，此详见下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买办籍贯统计

籍贯	买办人数
浙江	245
江苏	188
广东	58
安徽	9

[1] 海上名人传编辑部：《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第56页。

续上表

籍贯	买办人数
湖北	5
江西	4
福建	4
天津	2
北平	1
四川	1
河北	1
绥远	1
不明	数名

资料来源：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征信所的相关调查资料，并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元信编纂《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年）等。注：所调查的这些买办，主要以上海为主，但也涉及其他部分通商口岸。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中，一些买办的地域来源较为复杂，有人填写的是“籍贯”，有人登记的是“原籍”，有些人则直接填写“出生地”。如潘蕃孙，籍贯浙江杭县，生长广东。^[1]我们在统计时一般依据其籍贯或原籍来定。

在广东籍买办中，近半数又来自香山县，其名录见下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山（中山）籍买办、华经理名录

买办姓名	服务洋行名称	备 注
韦慕泉	美国运通银行买办	1933年12月26日调查
陈诒舄（字菊初）	太古洋行堆栈部经理、太古买办	1935年8月3日调查；1941年5月16日《大晚报》
陈炳谦	英商祥茂洋行买办	中山县梅溪乡。1934年9月5日调查
郑伯昭	曾任英美烟公司买办；永泰和烟草公司华董事及经理	1935年5月1日调查
郑颂尧	历任香港广利洋行买办、广州永胜洋行买办	1934年5月24日调查
莫干生	香港太古洋行买办	先后为永安公司、香港永安公司及永安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上海及香港大新公司董事。1933年7月24日调查

[1]上海市档案馆藏私企业务管理委员会档案：Q320-1-422，第260页。

续上表

买办姓名	服务洋行名称	备 注
沈麟生	亚细亚汽车公司买办	1935年1月8日调查
黄锦堂	美康洋行华经理及股东	1934年6月19日调查
黄福生	协和洋行茶叶买办	唐家村人。1934年1月23日调查
唐仲良	天祥洋行买办	1934年4月21日调查
唐宝泰（字冠东）	德商泰利洋行买办（一说泰来洋行华经理）	唐仲良之子。1934年4月21日调查
曾作霖	历任来发洋行、汇通洋行买办，后为新泰洋行华经理	1934年10月27日调查
李日照	谦义行华经理	1937年1月9日调查
李炳南	上海裕隆洋行华经理	李日照之子。1937年1月9日调查
李邦贤	瑞昌洋行买办、安和洋行华经理	李日照之子。1934年9月27日、1937年1月9日调查
李邦祥	美星洋行华经理	李日照之子。1937年1月9日调查
杨渭滨	太古轮船公司账房出纳主任、蓝烟囱码头买办	1934年7月14日调查
杨梅南	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烟台分公司买办及上海公司副买办、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	1934年5月16日调查
萧舜琴（一名鑑韶）	先后在英商祥泰洋行、德商德华洋行任职，后为瑞商华嘉洋行纸头部主任（华经理）	1935年11月14日调查
刘尚弼（字心壶）	德商兴成洋行华经理	1936年12月2日调查
麦应生	祥茂洋行副买办	祥茂洋行买办陈炳谦之长婿。1936年7月23日调查

资料来源：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征信所的相关调查资料。所调查的这些买办，主要以上海为主，但也涉及其他部分通商口岸。

除上述调查所及的20余位买办外，此外还有不少香山籍买办，如郑翼之、郑宗荫父子，先后任天津太古洋行买办；^[1]李元信，原籍香山，1923—1927年间任驻沪美国宝华制药厂华经理（专销西药及宝华奶粉），1930—1935年间，为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华北分行华经理；^[2]陈可良，太古洋行买

[1] 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52—853页。

[2] 李元信总编纂：《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年，第132—133页。

办；^[1]陈雪佳，陈可良之子，继任太古洋行买办；^[2]汪显兴，服务于太古轮船公司，并在一家名为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onton, Ltd.保安行任买办。^[3]在多种中外文资料中我们了解到更多香山籍买办的情况，这对深化香山帮买办群体研究无疑是至为关键的。

在相关的香山帮买办的资料，涉及较多的是这几个方面：（1）以往经历；（2）教育程度；（3）行业分布；（4）收入、资产及信誉状况；（5）家庭结构；（6）社会关系；（7）日常生活及宗教信仰等。本文限于篇幅，仅就上海香山籍买办的资产、信誉状况及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等予以考察。

在涉及香山籍买办的调查中，有关他们的生活，经常出现的词汇是“安适”、“优裕”、“奢华”、“豪奢”等。先看几位买办的生活状况：

陈炳谦，资产丰厚，约有三三百万元，以地产占多数，据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及虹口区内购置房地产甚多，较著者为老靶子路北四川路一带之地皮房屋，至北浙江路海宁路口之华安坊，江西路三和里及北西藏路公益里之房屋。^[4]

麦应生，住宅系自置产业，备有汽车2辆，在上海置有房地产颇多，如江西路天津路口永源里，占地约3亩，估值每亩约四五十万元，东熙华德路雷士德学校对面房地产约4亩，塘山路有基地七八亩，已建有出租房屋，海宁路粤秀坊沿马路之房地产，亦为麦君所有，闻在香港广州亦置有房地产，每月房金可收入1000元。除房地产外，又购置大宗股票，如上海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工部局公债等，均系可靠之股票，惟对于中国人所办之公司，均不愿加入，其资产总值约在三百万元

[1]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Editor-in-Chief: Arnold Wright,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p. 548-550.

[2] 海上名人传编辑部：《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第56页。

[3]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Editor-in-Chief: Arnold Wright,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p. 550-552.

[4]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083G，第59页。

以上。行庄往来：汇丰、麦加利等银行。^[1]

杨梅南，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财产在50万元以上，年收入约2万元，自置住宅，并以汽车代步，每年支出约一万六七千元。^[2]

陈诒当，系陈雪佳之族弟，太古洋行堆栈部经理、太古洋行买办，同时为永固造漆公司董事，新新公司监察人。资产总数约10万元，年入近1万元，开支六千余元。他在上海的豪宅位于新闸路1765弄15号，家里备有租界照会第2276号汽车。^[3]



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杨梅南

杨渭滨的资产总数在20万元以上，莫干山有别墅一所，上海法租界亦有住宅。每年收入2万元，每年支出一万四五千元。^[4]

调查中涉及这些买办的资产与信用评估。郑伯昭、陈炳谦、麦应生等人的资产在1930年的统计中均在百万以上，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豪富。其中，郑伯昭的资产总数约在1000万元以上（1935年5月1日调查）；麦应生的资产总值在300万元以上（1936年7月23日调查）；陈炳谦，本人财产约有二三百万元（1934年9月5日调查）。^[5]一般说来，资产多寡直接影响到信誉状况，香山籍买办的信誉评估大多为“信誉甚佳”、“信誉颇佳”或“信誉尚佳”。信誉欠佳的只有一位买办，他叫沈麟生，为亚细亚汽车公司买办，“性豪放，惟嗜赌。信誉欠佳。当家道盛时曾拥资五万元，后以代垫亚细亚汽车公司之款约一万八千元，未得偿还，并担保该公司之借款亦未清理，更以君赋闲在家已久，故今处境不甚宽裕”。^[6]这位信誉欠佳的买办，乃与他的交游

[1] 上海市档案馆藏私企业业务管理委员会档案：Q320-1-425，第259—260页。

[2]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102（10），第90页。

[3]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083A，第241页。

[4]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102（1），第195页。

[5] 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征信所的相关调查资料。

[6]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092（4），第32页。